

“五教同行 五好建设——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
探索与实践”研讨会

论文集

泰州市佛教协会
泰州市道教协会
泰州市伊斯兰教协会
泰州市天主教爱国会
泰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
泰州市基督教协会

2024.11

目录

综合

张志刚: “宗教中国化”时代性原则与我国宗教健康传承	1
黄夏年: “五教同行, 共致和谐”与宗教中国化	6
陈永革: 当前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之浅识	17
彭瑞花: 新时代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经验做法、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	26
于松: 浅谈宗教中国化泰州五好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33
王利军: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扎实做好“五好宗教活动场所”建设工作	38

佛教

秋爽: 和合思想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之作用及其当代实践论	43
纪华传: 从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探析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时代意义	54
董群: 儒佛交融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经验 ——以孝论为中心的考察	58
法空: 江苏寺院僧伽教育的历史经验与探索实践 ——以曾任泰州光孝律寺住持常惺法师为例	65
仁决: 现代视野下的佛教中国化问题浅析	71
果愿: 新时代下佛教传统丛林管理中如何加强“五好建设”	76
慈开: 新时代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 ——以关圣寺“关公文化”“二十四节气茶文化”为例	81
妙净: 佛教崇俭戒奢思想探析	86
昌善: 佛教中国化的内在理路与实践指导	91

道教

黄新华: 发挥道教文化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积极作用	101
邵佳德、邹利建: 道教义理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与当代路径 ——以成仙信仰为例	107
归萧峰: 试论道教中国化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实践 ——以江苏道教为例	112
杨安国: 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 弘扬道教优秀文化 ——泰州道教“五好建设”实践	120
房三铭: 新时代道教中国化: 传承与发扬, 新探索新思想	123
张迎春: 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 依法规范宫观管理	130

伊斯兰教

米寿江: 理性对话与会通 ——兼谈伊儒会通的贡献	139
马卫伟: 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 奋力做好新时代解经工作	147
季芳桐: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程与启示 ——以伊儒会通为观测点	152
熊化龙: 孝道: 伊斯兰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会通之处	157

杨 健: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163
沙宝卫: 开展“五好建设” 提升“四种能力” 在推进宗教中国化泰州实践中充分发挥伊协作用	170

天主教

孙红伟: 新时代下泰州天主教全面推进“五好建设” 坚持中国化方向走深走实	177
刘星峰: 坚持中国化方向 弘扬新时代主旋律	180
陆亿含: 泰州天主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历史及新时代进程中的深度剖析	183

基督教

李向平: 基督教中国化与地方文化关系的建设 ——地方基督教中国化模式初探	189
施成忠: 从沈寿的《耶稣像》的获奖浅谈基督教中国化的魅力效应	195
林培泉: 发挥和谐江苏基督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从圣经中的和谐神学谈起	201
李树岭: 对城市化进程中教会规范化建设的思考	211
万宝常: 建设五好团体, 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泰州实践	216

佛教中国化的内在理路与实践指导

昌善

摘要：在当今时代，因为信息多元化的原因，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看法也多有不同，为实现我们所希望的人生幸福，就佛教思想而言之，亦有其契合中国民众的广泛普及性，尤其是在中国弘扬开来的大乘精神与大乘法门，这种走近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中道圆融更具备研究价值，中道圆融的思想与行为是切合实际和易于操作的理论与实践，也正是我们需要研究与学习的。在中国大乘佛教精神的指引下，本篇主要对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作以梳理，直观了解佛教在中国的演变。其次，发现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一些不变的特征，也可以说这些特征即是佛教中国化的特色标志。最后，归纳总结佛教中国化对当今时代的积极意义，正如佛教大乘行人於法界任运自在一样，笔者在此提出几点相应的应对性建议，让新时代的我们能更幸福的生活，也能让佛教爱好者更好的去奉行大乘菩萨道精神，去创造价值、服务社会。

关键词：佛教中国化；大乘精神；内在理路；实践指导

前言

所有宗教都对民众所期许的幸福安乐加以诠释，乃至阐发出更深的理解。这一过程，慢慢的形成了现今的宗教哲学。而在哲学的层面，也有关现实的问题；乃至或有或无的指导与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为例，我们明显会发现宗教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带有中国的特色。梁卫国在《多维度下佛教中国化的必然性研究》中指出：

所谓佛教中国化，指中国佛教界在继承佛教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以政治上自觉认同、文化上自觉融合、社会上自觉适应为基本要求，建设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制度体系、教育体系和文化体系，成为社会建设的和谐因素和国家建设的积极力量的过程。^①

简单来说，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特色。例如，天台智者大师作为大乘佛教宗派最早中国化的实际创宗人物，他的一佛乘思想对陈隋之后的整个中国佛教界，乃至中国文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智者大师的思想，是带有中国色彩的对整个佛教思想的统筹兼顾，简单来说，就是以《法华经》^②“一佛乘”为中心的对大小乘佛法的整合与贯通，就宗教乃至国家大一统有着巨大的贡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已深入人心。就中国佛教的修行来说，大乘

选题：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新探索，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经验总结，昌善法师，浙东天台宗佛教文化研究中心法师（讲师），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阿育王古寺，17359293557,946503450@qq.com

^① 梁卫国：《多维度下佛教中国化的必然性研究》，中国宗教，2020-05-22。

^②（后秦）鸠摩罗什译：《法华经》，《大正藏》第09册。

佛教特别注重对成佛理论和成佛修法的研究,如禅宗讲的见性成佛、净土宗提出的念佛成佛、密宗倡导的即身成佛等,都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核心表现。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例子数不胜数,在此不再多言。

笔者仅以佛教中国化的名义为中心作以探究,以期达成认识与梳理佛教中国化对现实的指导。简单来说,就是对佛学本身与中国化的佛教对比,探索其原委,希望於普罗大众厘清佛学有深入之认识而提供依据与参考。

由此,窥测出佛教中国化对我们个人、僧团、社会贡献的重要之处,乃至对整个中国佛教理论建设的价值。

在此,采用教理指导和历史证据相互参照的教史合参方法,试图证明思想和行为的相互影响是确有所依的,用以说明宗教体验即修行证悟是可以存在的,亦是可能的。如此中国化的佛教学说的确能为宗教修行者作以参考之依据,也的确有功於世道人心。因此,正确认识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的佛教对宗教精神文明之建设、传统文化自信之重拾,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我们也寄期望佛教在当今时代能贡献和发挥很好的作用。

一、理论之构建

(一) 我眼中的佛教中国化

谈及到我们中国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也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一般来讲,即看做是从佛教传入中国后开始的演变。其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则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标志,也成为中国特色佛教的特质。

其中,人们往往都把以下几点作为佛教中国化的标志:

1. 以汉末佛教的传入,作为佛教中国化的起始阶段。

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时,佛教的传播闻名於世的多是佛门异术(神通),这与流行于汉代的道术(方术)相近。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特色之一,直至如今人们对佛教神通感应仍心怀好奇,亦是佛教徒众信仰的依凭之一。当然,在此时期的译经事业也较为突出。魏晋时佛教传播依托于玄学,成为佛教学说的基础,比较出名的是,当时的“格义佛教”。甚者,如今闻名于世的成为中国人伦理道德基石的三世轮回说和因果报应说,也是随着当时的佛教传入国人心中。因此,如今民间多是把佛菩萨当做传说中的天地神仙。

2. 东晋到隋唐时期佛教的转变,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宗派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鼎盛时期。

东晋以后的中国,人们历经战乱的迫害,佛教与人为善的思想取得时代的共鸣。佛教的影响面逐渐得以广泛与拓宽,使民间信仰的基础与佛教进一步深入与融合。中国原有文化与外来的佛教文化在冲突中得以融合,一时间佛教门派众多,互相争鸣。东晋末年,译出的佛家经典越来越多,讲经谈论的活动兴起,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论战时期。随着中国隋唐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的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也由不同异说的论战转变为求同求通统摄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流派。韩焕忠在《方立天先生对佛教中国化的论述》中谈到,“至于

隋唐，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相适应，涌现了天台、华严、禅等具有统一和整合全部佛教经典、义理和修行方式的宗派”^①，可见，佛教中国化的初步完成，是因为提出了成佛法门的大乘八宗的成立。

3.宋代三教思想的兼容为佛教中国化的融和时期。

到了宋代，佛教的主流是禅宗，而此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逐步走向融通的道路。为使国家正统思想日益调和，就有了比较出名的有宋明理学、心学，程朱理学一派融和了华严宗理事无碍的理论，建立了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陆王心学，融和了禅宗的心性学说，建立了心外无物的学说。可以说，佛教中国化的融和时期使得佛教思想慢慢步入了社会思想的各个领域。

4.宋以后，佛教开始融入日常生活，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世俗化时期。

宋代以后，佛教中国化基本已深入中国世俗日常，其逐渐走向深入的佛经理解时期，形成了多元化的中国化佛教。在此期间，主要表现为逐步完善的系统性的佛教义理论释、规划性的实践修行以及普通与特殊并用的佛教传播。其中，佛教对中国文学、风俗、艺术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影响，佛教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佛教中国化世俗面的突出标志。

(二) 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其实，佛教中国化的特点，都是以其凸显的不同而进行论述的，上述四个时期，佛教中国化的特征都有体现，只不过巧说一端罢了。在总体讲佛教中国化上，与印度佛教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

在通俗的理解上，或许有人认为好简成了中国佛教的基本特征。但是，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又有几人见了性？

或言：人人都具佛性。那么，什么是佛性？

或言：真智显露，就明心见性，内外彻悟、见性成佛。那么，何谓真智？

诸如此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是对中国佛教的特征理解有误所致。因此，对于佛教中国化的理解要究其本末。

本末之不同在于用，如佛法之传承，本在内自证，而末在他印证。内自证在于自行之种种法门，证悟种种智地；他印证在于取信于人，可为依止，教化有缘。所以，中国化的佛教，重心在于佛教、特色在于中国化。一言该之，自他成就的一佛乘就是中国佛教的基本特征。从上面的推理论证，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化的佛教特色，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好简，而是佛法思想的最究竟、最高级的统筹。他不仅具有大乘佛教的最高理想（成佛），而且具备了小乘佛教的细节落实；若不如此，则我们学到的大乘佛法终将变为一纸空谈。因为中国佛教的多元化，所以他不像印度佛教会有单线的传承（唯一小乘）；而是独具特色的大小偏圆多线传承。其中，中国的大乘八宗更是皆具兼容性的一脉相承或交叉相承。

^① 韩焕忠：《方立天先生对佛教中国化的论述》，宜春学院学报，2020-08-25。

什么是佛教？或可解释为伴随着佛教经典的流传、结集、传播、传译，直至正统的诠释等种种现象；乃至深究其源底的实修实证。其中，正统的前缀，必定是王朝大一统的历史背景，兼顾大乘佛教的最高理论而言的。

对于佛教的界定，或可解释为佛所说之圣言量。而对于圣言量的范畴限定，从宗教自身的角度，特指如天台圆教所阐述的，认识诸法实相，所谓诸法一相、一相无相；则是真正之佛法界之教法，简为“佛教”。而对于佛教中国化来说，解释为佛所说之圣言量，即是一般意义上的五乘教法。他不仅包括了解脱道、菩萨道的内容，而且还包括了人天道的内容。中国化从社会的层面来说，更多的是佛教人天道的内容，比如五戒十善、遵纪守法、爱国爱教等等；中国化从哲学的层面来说，他可以是对于宇宙人生终极理论的探究，则不出解脱道的内容；他也可以是对社会积极贡献、服务社会自我体现价值的角度落实，则不出菩萨道德内容。在弘化佛教上的善巧方便表现，同佛教在中国即佛教中国化一样；这也是大乘精神的大权示现。中国化从宗教自身来说，既知其然，则须应机追寻其本源——修、证佛所教。

一、佛教中国化的特质是实修实证，主要外在表现为自行与化他

综上，对佛教的思考，佛教中国化主要表现为在中国弘化的祖师大德应对本国情况（包括时代背景、不同众生根机）而制定的种种法门，其实际是离不开大德们的实修实证、个人情操等内容的。若无化他法门的修行，则无应机施设的方便；若无对根的善巧方便，则无实修的体现；如此随缘与不变，方不负佛教中国化之名。

二、佛教中国化的核心是大乘佛法，主要体现在菩萨道的方便与究竟上。

既已了解佛教中国化这一现象在于修道者的自他行为，那么修道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便是大乘菩萨道。在《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问题》一文中，作者提到：

佛教在地化及中国化的内在动力源于佛教中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系统论证从印度大乘经典的思想建构，到中国古代佛教的义理论释，无不融贯对于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认识与理解。^①

可见，无论是印度佛教经典中的善巧方便，还是中国佛教的历代高僧的智慧善巧，都是以大乘菩萨道为核心的，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特征。

或有人言：小乘亦有。此不难解，大能摄小、小不容大，重在大乘，於小无碍。乃至深入源底，实是立足于菩萨道的方便与究竟上。

或有人言：大乘亦嘉，实难见行。此不难解，佛道旷远，难信难解。世道人心，向善向善，初心易知，久修难行，今所倡者实是如此。

三、佛教中国化的修行拣择标准是一脉相传的，也是不变的真理，简单说为，初心后的凡夫位与圣人位；亦即为正观和真观，树立正见的趋向修行，以及证得真理的中道修行两层。

^① 程恭让、常凯：《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问题：关于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的再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11-10。

佛道广博，实难穷尽；菩萨智度，亦难思议。对于佛教中国化的判别核心，大乘菩萨行的拣择依据有：

发菩提心。此出华严。

大般涅槃。此出涅槃。

诸法空相。此出般若。

诸法实相。此出法华。

诸法实相。此出智论。

入不二门。此出净名。

一真法界。此出华严。

涅槃妙心。此出楞严。

诸多经论，竟说纷纭，皆是大乘法门，而修道之判别标准为大乘佛教之特色，也是中国化佛教之特色。

二、实践之建立

（一）实践之理论

我们稍稍回忆历代前贤的心声，不免会发现，佛教徒首先是一位国家公民。而作为公民的我们，作为佛教徒的我们，必定有时代的责任和使命。这也是中国化佛教理论的前提，在《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模型、演变路径与经验启示》一文中，也特别指出：

中国佛教面临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法治化等新环境和新机遇。这些新的环境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的剧变，另一方面也为佛教发展带来了全新机遇。可以说佛教中国化面临的与当代中国发展相互调适的任务依然存在。^①

站在社会层面，要做到天生我才必有用，也就是实现佛教徒的存在价值。中国化的佛教引导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斗终生；正如周总理在少年时呐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道出了作为国家公民的社会责任，我们佛教徒也要通过读书学习更好的提升自我，为社会大众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不仅佛教信徒如此，儒家横渠先生张载也提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儒家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他提出知识分子应济世救民，也正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爱国精神，作为佛教徒的我们，也应如此：应有大丈夫志干，直面人生，直下承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菩萨发心，为国家繁荣富强奉献自己的力量。

站在个人层面，我们作为佛教徒，就要有崇高的理想和高度的觉醒。一方面，如诸葛孔明说，要志当存高远；一方面，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做好随时适应与接力的工作。

为什么说志当存高远？也就是要我们立大志呢？简单来说，立大志就是为了达成我们既

^① 张志鹏、张华：《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模型、演变路径与经验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1-10。

定的目标。不论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追寻的那一份自在解脱；都离不开既定目标的树立。所以阳明先生王守仁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只有树立目标，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只有树立目标，才能实现佛教的净土。

刚刚提到了事成必要立大志？那么，我们的大志是否合理？我们的大志如何实现呢？故而，立大志需要大智慧、大眼界。如此，才不会树立一个伪命题的理想；如此，才能有快速实现愿望的前提。墨子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这需要对我们树立的目标做深入的理解，其必须具有广泛的适应性。适应国家的要求，适应佛教所倡导的真善美。

最后，为了成就我们的大志？需要很多的要求。比如，立大志需要大毅力，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说的就是要有不怕吃苦的忍耐功夫。又比如，立大志需要长远心。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又比如，立大志要从微细处下手，从小处去改变。我们都知道，个人是大众的一份子，个人在大众中得成就；因此，改变就从微细处开始、从习惯开始、从态度开始。

中国化佛教之特色，不仅具有大乘佛教的最高理想（成佛），而且具备了小乘佛教的细节落实；可以归纳为具备中道圆融思想的大乘精神践行者与引领者。怎么梳理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关系呢？为什么说中国化的佛教可以指导佛教徒的实践呢？我们以大乘佛典中具有“经王”之称的《法华经》为例，讨论大乘精神的经典理论构架与依据？

《法华经》，全名《妙法莲华经》，他是大乘佛教非常重要的经典，是最早中国化佛教宗派天台宗的立宗经典，法华经所讲的就是会三（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归一（究竟归为一佛乘）的思想，因此，我们说他是“成佛的法华”。所以说，《法华经》宣说的就是成就佛果的因缘。可以说，从宗教信仰来看《法华经》的功德无比超胜，不可思议，读诵受持就能获得殊胜的加持；因此《法华经》对国土康宁、众生福祉有着莫大的利益。而今天，我们就立大志，树正见，这一理念的确立；是与《法华经》提到的佛出世的目的为了让一切众生究竟离苦得乐，成就佛道，这一理念的确立是一样的重要。

可见，世出世间树立最高理想的地位，必将是决定无疑、必将是明确真实的。如此：

1.从道理上说，《法华经》直接挑明了佛教徒的志向必定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一切行动都以此成就佛道为归结。可见，就我们公民而言，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为佛教徒，中国化佛教所具备的中道圆融的大乘精神，必能与社会主义社会团结一致、不相妨碍。

2.从因果上说，好的思想指导我们成就好的因缘果报，所谓正因得正果；中国化佛教所具备的中道圆融的大乘精神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参考，大乘精神就是好的思想指导，能指导我们成就好的社会、好的人生。

3.从世出世间的角度说，大乘佛法讲，“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佛法具备不可思议的力量，冥冥中可以起到“护国佑民”的作用；从世间的层面讲，就是修持佛法、守护国家；从

出世间的角度讲，就是成就圣果，功德加持；从内外关系讲，护法是护持内在的信心与修行，护国是护持外在的国土与众生，内护与外护互为因缘，内护统摄外护。可以说，内护就是正见，外护就是正行；正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我们的价值理念与行为准则。这样，就可以理解佛教的护国理念及其传统，也能理解佛教在两千多年的传承中，为什么普遍受到国家的支持。因为，佛教的弘扬，对国土的安宁和民众的幸福有很大的利益。因此，可以说一切大乘经典，都具备护佑国土、民众的殊胜功德。

（二）实践之方法

实践之方法，就是落实到我们生活中的窍门与技术。

佛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但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从实践上看，佛教在社会道德、法律法规、经济生活、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主要内容是努力弘扬和实践人间佛教思想。^①

以上，我们归纳中国化的佛教具备实践上与理论上的可行性，值得我们去分析与学习：站在社会层面，要做到天生我才必有用，也就需要中国化的佛教引导我们，去实现佛教徒的存在价值；站在个人层面，作为佛教徒，就要高举崇高理想的旗帜付诸于高度的行动力。

由此可知，落实好中国化佛教的实践，就是要做到树立见地与付诸于行动这两个方面。简言之，就是中国化佛教的发心与行动。换言之，就是具备大乘精神的心行。

首先，具备大乘精神的心，就是价值观的树立，也就是立大志。

不管是什么样的观念、知见、见解、见地；我们都应树立，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爱国爱教；读书学习，提升自我，服务于家庭、集体、国家，乃至天下的价值理念。

其次，我们要明白树立价值观的意义，也就是具备大乘精神的心有什么好处。可以说，欲是一切的开始；善法欲创建好的世界，恶法欲构建坏的、糟糕的世界。

最后，具备大乘精神的行，就是要有佛教五乘教法这五种不同的善恶判别。简单介绍，即是四类（汇归声闻乘、缘觉乘为二乘）善恶的比较：第一类善恶，就是人天乘中“十善”为善，“十恶”为恶；因此，劝导我们广行十善，成就人天善果，第二类善恶，就是二乘解脱道中，在空性的基础上，讲无我、无我所；因此，劝导以了生死为期的行者，行无我人空之善；其中，十善也是解脱道的前提。第三类善恶，就是菩萨乘中，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菩提心为善因。其中，十善和空性是菩萨乘的前提。第四类善恶，就是如来乘中，如来如实知见三界之相，以若干因缘、譬喻言辞、种种说法，所作佛事，未曾暂废。简单来说，就是佛教讲的中道实相为一佛乘的善因。

所以说，树立五种不同的善恶价值观，也就是在这些价值观的引导下正信、正行。在中国化佛教的发心与行动中，在具备大乘精神的心行指导下，提升生命的质量、引领时代的潮

^① 纪华传：《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的历史根源与时代意义》，世界宗教文化，2017-10-15。

流。核心技巧在于启发我们的自觉，指示我们于当下的日用中，或直接或通过反观发问的自省，承担和体悟自己在做什么事，明白事法的缘起缘灭、正因正果，直下承担。

（三）制度之意义

上面强调了落实好中国化佛教的实践，就是要做到树立正见和付诸于行动，也就是要具备大乘精神的心行。虽然很好的为个人实践做了阐述与介绍，但却独缺少了在社会层面的实践指导方法。因此，为了解决大众共同的问题，我们以中国化了的丛林制度作以参考。

中国佛教之丛林清规，也就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共住规约。其对现世寺院的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丛林清规，显然是佛教东传受到中国文化融和的标志。严格地说，佛教经过中国文化的交融，确有两件大事，足以影响佛教后来的命运。第一、天台宗以五时八教，贤首宗以五教十宗，概括佛教的体系，这便是有名的分科判教。第二、则是丛林清规的制度模范创立。它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包括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以及适合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是历代祖师为了维护修持、成就道业的究竟方便，参照佛律订立的各项规章制度为丛林所共同遵守，故俗称丛林清规。

如果说天台、华严两宗严整评判的佛学是佛学思想原理方面的整理；那么丛林清规制度的模范创立即是佛教在实践行为及礼仪方面的重大创新。

就佛教本身的传承而言，不管是从世俗层面的师资相摄也好，还是从佛教根本教义的传佛心印也罢，中国化的丛林制度都为其提供了保障依据。鉴于中国的风土民情与地理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适宜的制度，能因地制宜的解决诸多问题，还能起到树立正统（大一统）、稳定人心等作用。

当然其制度本身要符合大乘精神的那种平等自在，也要考虑到其特殊性，否则“法久弊深”则丧失了佛教所提倡的平等精神与实践（修证）精神。尊为方外清高的丛林，历传久远，是天下一家的制度，其中绝对不能存私。要切实修到无我的境地，是佛教徒的目的。为了追求实现心地成佛的最高境界，一面离尘弃欲，决心解无为，一面又苦志精勤，誓愿如大海；如此，一心勤精进（於心地成佛），至死以身殉道亦无悔。可见，为了实现中国化佛教的大乘精神，离不开佛教制度的优越性，离不开发挥佛教优越的制度。